

写作研究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

目 录

不要再画地为牢·····	李 蕤 (1)
从“画龙点睛”的故事谈起·····	李 蕤 (7)
努力写好新时期的新英雄·····	周 勃 (11)
诗论二题·····	江 柳 (16)
诗与诗人	
诗的意境	
谈谈短篇小说的结构·····	李德复 (54)
天高海阔任飞翔	
——谈文学创作的想象·····	黄家雄 (63)
论文学创作基本功的训练·····	涂怀章 (73)
一、设法丰富生活	
二、炼出“政治眼睛”	
三、培养思考习惯	
四、掌握表现技巧	
五、运用积累手段	
六、坚持单项练习与综合实践	
谈谈我是怎样写《眼镜》的·····	刘富道 (103)
诗心如火	
——读杨朔散文有感·····	许平辛 (119)
谈谈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	洪威雷 (126)
谈《地质之光》和《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二、谈《哥德巴赫猜想》

报告文学的剪裁艺术

——读在《湍流的涡旋中》……………王 铁(157)

漫谈《追报表》……………邱汉松(162)

古代文章写法初探……………邓先正(182)

一、文以明道。文章合为时著

二、行天下、读万卷书

三、炼意、立主脑

试谈比较法在新闻写作上的应用……………张 恭(204)

把“井”打深些

——采写事件通讯的几点体会……………涂怀呈(220)

论说文写作漫谈……………肖松林(241)

一、关于几个认识问题

二、关于论点

三、关于论据

四、关于论证

五、关于文风

六、关于地方报纸社论的写作

七、关于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写作

论作家的风格(文摘)……………曾令甫(287)

论写作(文摘)……………李辅澄(294)

编后记……………(318)

封面设计……………中 流

不要再画地为牢

· 李 蕤 ·

“画地为牢”，就是在地面上画一个圈子作为牢狱，把自己圈在里面。规规矩矩，不准越雷池一步。这一成语，也是对思想保守、固步自封的一种讽刺。

当然，在现实生活里，甘心“画地为牢”的人是不多的。人总是讨厌牢狱的，关在牢里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想挣脱出来，除了白痴和死人之外。然而，在思想领域，精神领域，这种“画地为牢”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譬如，满清入关，强迫人们的脑袋从“束发顶冠”改造为后边拖一条长长的猪尾巴一样的发辫，是经过“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屠杀才达到的“伟绩”。当时不少人为这件事而抛掉头颅。后来，满清被推翻了，可以剪掉辫子了，但却有人还不肯把辫子剪掉，这中间，象鲁迅的《风波》中的赵七爷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为了等待皇帝再坐龙庭的固然有，而象七斤嫂那样只是为了免祸而哭啼跳井的人也大有人在。又如缠足陋习，本来是从唐后主荒淫无道，把妃子当作玩乐工具的产物，但流风所及，使亿万妇女多少代被折磨得筋断骨折。后来可以不缠了，提倡“放”脚了，更进一步禁止缠脚了，可是，仍有些人以丑为美，宁冒受罚的风险仍把女儿脚裹成三寸。一直到全国解放，这陋习才完全绝迹。这说明画地为牢的顽固势力，确实是不易消除

的。

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帮凶，是深知这一点的，因此，胡适对日本侵略者献策的时候，提出“征服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征服人心”；“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时候，首先着眼于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们的办法是在人们的思想上，东设一个路障，西设一个禁区，使你画地为牢，动弹不得，然后牵着你的鼻子，使你驯服走向他们的屠场！

以文艺创作的题材来说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反映的是人民的生活，目的在于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它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是不存在什么禁区的。毛主席的延安讲话，提出了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以及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指示我们要在深入生活中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反映各种形式的生活斗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给文艺创作提出了极为广阔的天地。为了真实的充分的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毛主席反复强调要深入生活，学习社会，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文艺技巧，改造作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但却从来没有在创作题材上划过禁区。我们的革命前驱鲁迅，也反复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自己是不是革命人，倘是的，不论写什么题材都可以创作出革命文学，如果作家自己不是革命的，即使是选取了革命题材也不过是“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罢了。而“四人帮”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文艺创作题材问题上，划了无数的禁区，设置了许多“此路不通”的路障，从时间上说，他们割断历史，把他们插手文艺之前说成是“一片空白”，写革命传统题材是“歌颂民主派”，不能写；从空间说，这个地区有过错

误路线，那个地区有过错误领导人，写这个地区的事，就是为错误路线脸上贴金，不准写；从人物说，连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属于“中间人物”，不能写；写老英雄模范是“贬低新生力量”，不能写；从生活内容来说，歌颂新人新事的，是“无冲突论”，不能写；揭露社会矛盾的，是“暴露文学”，不能写；……总之，所有的路，全被切断，堵死，到处画地为牢，使人动弹不得。只有一条独木桥，就是一律咒骂他们所谓的“走资派”，一律歌颂他们为榜样的“英雄”人物，宣传他们理应“坐第一把交椅”。他们妄图用画地为牢的办法，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把文艺绑在他们反革命的战车上。

然而，霹雳一声，他们被粉碎了。广大文艺战士，在欢呼声中又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开辟的文艺大道上。

“四人邦”设置的路障，被拔掉了，不准进入的禁区，被冲破了。两年来，文艺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撕碎了他们那些极“左”派的迷魂幡，把他们的什么“三突出”、“根本任务论”、“黑线专政论”驳得体无完肤；不少作者以创作实践，冲破他们的禁区，越过他们的路障，许多被禁锢多年的题材解放了，许多被窒息的文艺形式复苏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开始到来了。

然而，画地为牢的情况还有没有呢？还不能说没有。随着深入揭批“四人邦”运动的深入，有些和读者久已睽违的题材又重新出现了，有的是揭露“四人邦”的罪恶的法西斯统治的，有的是反映“四人邦”给我们人民精神上留下的巨大创伤的，有的是从正面或反面告诉青年如何对待爱情的，……这些新颖题材的不断出现，正是双百方针继续贯彻的正常情况，不

少读者为之欢欣鼓舞，热情欢迎。但有的人一看到这些，就忧心忡忡，疾首蹙额，好似又看到到大难临头的朕兆。看到一些传统剧目的开放，便惊呼“帝王将相又上了午台！”看到《天仙配》、《阿诗玛》的上演，便惊呼“才子佳人和神仙鬼怪又复活了！”读到小说《伤痕》，便惊呼“这是暴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总而言之，在这些同志的眼睛里，这些都是“异端”，不是“正路货”，最好不出来为好。

在这篇短文里，不想也不可能为上述受非议的作品一一辩护，只就《伤痕》稍微谈几句。这篇作品，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青年写的，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女青年在文化革命中，在林彪、“四人邦”的迫害下，她的母亲（本来是个忠于革命的老同志）被打成“叛徒”，她自己当然无力识别，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大义灭亲，断然和母亲决裂；尽管如此，她仍然摆脱不掉“反革命子女”的帽子，在“唯成份论”的无形压力下又不得不割舍她的爱情（在男朋友为她受到压力时，她毅然和她分手）。在“四人邦”的网罗中，她的心灵受到两次深刻的创伤。待到“四人邦”被粉碎，母亲的冤案得昭雪，她千里迢迢回去看望妈妈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伤痕不是很容易平复的。读过这个作品的人，都会同这个作品中的女青年共脉搏、共呼吸，从内心深处燃烧起对“四人邦”的仇恨火焰，从而加深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热爱与拥护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有什么不好呢？

说这样的作品是“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这种说法真是糊涂得很。林彪、“四人邦”是最腐朽最反动的阶级代表，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揭露他们的罪恶，怎么会变成揭露阴暗面了呢？这种逻辑不是奇怪的逻辑吗？如果是

出于好心的糊涂，希望把这条大界线画清楚。

这条大界线划清，所谓“暴露文学”的非难也自然落空。无产阶级文艺，从来不一般地反对暴露。毛主席讲得清清楚楚：“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伤痕》暴露的对象，难道不是凶恶的敌人及其在人民中的恶劣影响吗？这样的暴露，为什么不应该呢？

“那么多和‘四人邦’斗争的英雄，为什么不写，偏偏写觉悟这样晚的典型呢？”这又是一种责难。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不错，在青年中，对“四人邦”的阴谋早已觉察，奋不顾身出来反抗的，大有人在，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青年的光辉典范，文学艺术应该充分描写他们，歌颂他们，树立青年一代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典范。但丝毫也不排斥象《伤痕》中女主角这样的青年。她单纯、幼稚、无条件地相信组织，自己承受苦难而看不到苦难的根源默默忍受的青年，同样是大量的，她的遭遇，同样可以激发读者的革命义愤。作品的不同主题，要求不同的人物典型。《伤痕》是悲剧。悲剧是美好的事物被毁灭。完成这一特定主题，不是另外的主人公可以代替的。我们应该记取“四人邦”否定歌剧《白毛女》杨白劳典型的教训。孤立地看，歌剧中的杨白劳比巴蕾午中的杨白劳“觉悟”低得多，他没有抡起扁担打敌人，他屈从命运，喝了卤水自杀，临死还向女儿哭诉“你爹我有罪不能饶……”然而，正是这一个杨白劳的典型，激发起千万读者的怒火，激发起“替喜儿报仇！替杨白劳报仇！”的力量。换掉了杨白劳，也就失去了歌剧《白毛女》。因此，在对《伤痕》这种批评里，不能不令人遗憾地看到“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框框还未打破，“四

人邦”的“根本任务论”还起着“画地为牢”的作用——不从生活出发，不论什么主题，都要求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

华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为了创作更大的繁荣，真正实现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希望我们慎思明辨，划清被“四人邦”弄乱了的是非界线，彻底从“四人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要再“画地为牢”！

从“画龙点睛”的故事谈起

· 李 蕤 ·

古代传说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有名的画家在金陵安乐寺的影壁上画了四条龙，每条龙都画得栩栩如生，但都没有点上眼睛。别人问他原故，他回答说：“一画上眼睛，这些龙就腾空上天了。”人们不相信，让他在一条龙上试试看，果然，那支龙一点上眼睛，就摇头摆尾，腾空上天，其他三条未点上眼睛的龙，仍然留在墙壁上。“画龙点睛”的美谈一直流传下来，经久不衰。

从这个美丽的故事里，我联想到文艺创作中题材和主题的关系，似乎得到一点启发。

文艺是生活的再现，来感染人教育人的。生活本身，是五色缤纷，多光多采的，作家只有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生动的描绘，才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它的感染。如同画龙，龙的矫健的身影，龙的一鳞一爪，都需要一丝不苟，精心描绘；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忘记，任何文艺作品，都是有倾向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归根结底，是以文艺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的，它必须有鲜明的主题，如同画龙必须点睛一样。否则它就只能永远贴在墙上，不能飞升——不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四人帮”一伙，提出“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

荒谬理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因为，根据这一条“理论”，他们就可以命令作家艺术家闭起眼睛，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捏造生活，把真正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而把那些“角”、“刺”、“鹰犬”歌颂为“英雄”。这一点，经过反复批判，已经洞若观火，在这里就不再多加阐述了。就是抛开他们这一反动政治目的不谈，仅仅从理论来说，主题先行论已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和唯物论的反映论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先验论的老货色。远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无情地批判过这种极“左”的理论，指出那些认为“只要取得无产阶级意识”即使不接触生活便可以产生革命文学的理论是错误的，指出这样的革命作家往往和现实生活一接触便碰得粉碎，很快从左翼变为右翼。”鲁迅是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主张无产阶级文艺应该和工农大众一道受难、反抗、战斗。鲁迅的主张和毛主席反复教导深入生活，把人民群众作为唯一源泉的真理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四人邦”被粉碎了，“主题先行论”被踏在脚下，大家认识到这种理论，是纸包着毒药。“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文艺界共同的呼声，成批的作家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在批判了“主题先行论”之后，有些年青朋友却产生了另一惶惑。他们来信问道：“批判了主题先行论，是不是主题就不重要了呢？要求作品有鲜明的主题，人物故事情节要服从主题，这些说法是不是错误的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批判“主题先行论”，丝毫不能贬低主题的重要性。主题是作品的灵魂。没有正确的主题的作品，即使再生动细致，就

和一个生长得很漂亮却没有思想灵魂的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评判一篇作品的标准，总把它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因为，一切艺术手段，归根结底，都是为它要宣传的目的服务的。

以鲁迅的作品为例：《一件小事》，作为题材说，确是很“小”的，只写了一个人力车工人碰伤了过路的老妇人自己毫不诿卸责任，挺身担当过失的日常小事。但在鲁迅的笔下，却挖掘出这一题材所蕴藏的深刻内容，让读者和作者一道，从这个劳动者身上看到工人阶级高大的身影，从这件小事上得到“使我自省，催我新生”的力量。如果这篇作品没有这样深刻的主题思想，即使把这一事件的描写的再细致生动，维妙维肖，又有什么价值呢？

毛主席的诗词，也是如此。如《卜算子·咏梅》一词，从题材说，歌颂的是迎风傲雪的红梅，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写过的题材，但是诗里包含的主题思想，作者所抒写的思想感情，却是高度地概括了当时整个工人运动，写出了“已是悬崖百丈冰”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形势下，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巨手挽狂澜的英雄气魄，预见将来必然又山花烂漫的革命远景。由于主题思想的深刻，这首词和陆游的《咏梅》，形成霄壤不同的对比。相形之下，陆游的藉梅嗟叹自己的穷困潦倒，就渺小得多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因此，鲁迅是谆谆教导我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所谓“开掘要深”，就是要对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作深刻细致的观察，挖掘出它蕴藏的深刻的主题思想。

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取决于

作者对生活理解的深度。因此，学习生活，学习社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中学会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问题，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终生的课题。

“主题先行论”的所以荒谬，重点在于“先行”，用先验和概念来套生活，把头脚倒置。这和从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出的主题，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篇作品，经过酝酿和构思，秉笔之前，有明确的主题，设置人物，安排情节，都要服从主题，这不仅不是应该反对的，而且是必须遵守的规律，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招致主题分散或主题模糊。我们泼脏水的时候，千万不能把孩子一道倒掉。

今天，我们八亿人民，正紧跟华主席开始新的长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踏步前进。巨大的生活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双百方针的贯彻，为我们开拓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广阔天地。每一条战线，都在龙腾虎跃地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文艺工作者，都是画龙的丹青能手。让我们吸取画龙点睛的故事，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使每条龙都能离开墙壁，腾空而起，飞入八亿万读者的心田！

一切比喻，正如列宁同志所说，都是有缺陷的，画龙点睛，是最后一“点”，使龙一下子形神兼备，而文艺作品的主题，是在情节中的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外加”上去的，说明这一点，是希望不引起节外生枝的误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于武汉

努力写好新时期的新英雄

周 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开始了！

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这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云蒸霞蔚，万紫千红的壮丽图景，就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我们这一辈人曾经不同程度地遭受过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浩劫，如今躬逢盛世，又成了历史的幸运儿。

历史的转变开始了，文学，作为思想战线上的尖兵，应该怎样欢呼和宣传这个转变，促进和实现这个转变，乃是当前很迫切的问题。

早几个月，以《班主任》和《伤痕》为代表的一大批短篇小说的出现，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和赞赏。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对我国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把许多急迫而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震人心弦，发人深省。这些作者们对生活的发隐烛微的探索，对常见的社会现象富有哲理性的独特思考，都不是通过一般理性说教告诉读者，而是熔铸于富有个性特征的生动形象之中去感染读者，唯其为此，作者创造的人物愈是从生活出发，愈是植根于深厚的

土壤之中，便愈有较高的概括性。在多次的座谈会上，我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厂里那个谢惠敏”，或者“那个人又是一个谢惠敏”，谢惠敏早已从那个光明中学走出来，跨过行业，跨过年龄，跨过地域，而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种普遍性的典型。问题就是这样，作家以“真的艺术家的勇敢”，揭露出社会生活的矛盾，创造出高度概括性的生动形象，不仅在内容上笔力千钧，力透纸背地揭批了“四人邦”的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而且在艺术创作的道路和方法上，也显示出和邦八股作斗争的战斗实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萌生着我们新时期的新文学。

现在，一个伟大的转变开始了，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从我们沸腾的战斗生活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如群星灿烂，交映辉煌，我们不仅要写张俊石、欧阳平那样的英雄，以响应三中全会的“继续打破林彪、四人邦的精神枷锁”的号召，同时更要努力写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将要大量涌现的新的英雄人物。

但这是“四人邦”设置的禁区。“四人邦”的“根本任务论”，“高大完美论”这一套写英雄人物的谬论早已批得体无完肤了，但余毒仍有影响，甚至令人心悸。比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就与写英雄人物有直接关系。文艺一定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却被“四人邦”搞得混乱不堪。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全面专政”，“无情斗争”，“打土围子”等等，至于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产，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建设，都排斥在政治之外，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四人邦”的口号：“勤勤恳恳抓生产的走资派”，这里的政治都是超脱于经

济、建设等等之外，并且与经济、建设等等是对立的东西，既然如此，怎么能描写、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英雄们？如果描写了，歌颂了这些英雄们，岂不是非政治化的倾向？

这是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无产阶级的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战斗任务，当然也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

“如何理解政治呢？”——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的残余，粉碎全世界资产阶级屡次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而“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我们要“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这是十月革命后不到四年时间列宁说的话，那时枪声方止，硝烟未灭，列宁把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心转移当作“主要的政治”。在党的三中全会公报里，是这样估价这个伟大的转变的，“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还要改变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很清楚，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场经济方面、建设方面的硬仗，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上、思想上的深刻革命。文学作品努力去描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英雄们，不仅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出色地完成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崇高神圣使命。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成文或者不成文的“理论”，

好象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生活的阴暗面时，需要提倡作家的胆识和勇气，而在描写和歌颂英雄人物时，没有风险可担，因而不需要这样。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粉饰生活、谎报太平的作品和“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英雄人物的最好注脚。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仅在揭露社会矛盾、批判阴暗面需要胆识和勇气，而歌颂我们新时期的新英雄，尤其需要胆识和勇气。因为这里同样有“四人邦”设置的禁区和禁令需要去突破；同样有长时期形成的习惯势力需要去冲决；同样有旧的思想意识需要加以批判；同样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需要去介入。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那种光会说大话、空话、屁事不懂，屁事不干的；那种一付冷脸、二目无光、三餐茶饭、四肢无力的，我们决不能当作英雄去描写和歌颂；我们只能当作反面典型去鄙弃和批判。而对于横眉冷对“四人邦”的高压毫不弯腰的人，对于善于调查研究、敢于实事求是的人，对于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坚持平凡而伟大的劳动的人，对于胸怀壮志，不舍昼夜，攀登科学高峰的人，对于日新月异、不断发明创造的人等等，我们就应该用最炽热的感情、最绚丽的色彩，最激越的旋律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这是我们作家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的体现，是我们革命文学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然而描写和歌颂这样的英雄，上面所列举的种种阻力，将纷至沓来，一个没有胆识和勇气的作家，只有怯而却步了。鞍钢的王君绍，他组成了一个一百〇八人的小分队，竟代替了原来两千人的劳动，一下子节省了一千八百九十二个劳力，试想如果全国人民都象这样，我们的新长征步伐要加快多少！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日要提前多少！就是这样一位著名英雄，创造了如此惊人的战斗业